

城商联姻 其利断金

许伟 卜工

2021年12月3日《万邦林立 有城乃大》(简称“有城乃大”)在本报刊出。提出有城族群的地望就在山西晋中及以北地区,其国都正是彪炳史册的“有城之墟”,而石峁古城便是这千古流芳的地标性建筑。本文就城商联姻的制度问题再做探讨。

晋中陶鬲 专注有城

有城族群的地望在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前人曾有考证,但始终没有地下资料佐证,族群标志更鲜为人知。那么,晋中陶鬲是怎样与之攀上关系的呢?首先,要说明什么是晋中陶鬲。简言之,晋中陶鬲是晋中地区龙山时代双鬲鬲、夏代高领鬲、商代深腹鬲的统称。此三种鬲是连续发展有机整体,是晋中地区陶鬲发生发展的完整过程,也是地域性的文化特色和历史景观。它们均是本地土生土长,年代分期阶段清楚,递嬗发展规律清晰,谱系关系传承明确。其中,双鬲鬲经过双鬲高领的阶段演化为高领鬲的环节,忻州游邀遗址有翔实资料;高领鬲到侈沿深腹鬲的发展脉络有太谷白燕遗址确凿的研究依据。因此,双鬲鬲、高领鬲、深腹鬲实属同宗同脉的传承大系。显然,用统一的名称加以概括,既有利于从标型器的谱系上说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又有利于表达族群文化特有的地域性。

这让人联想到黄河流域下游以陶鬲闻名的上古遗存。与晋中陶鬲一样,那里的陶鬲造型固定,标准统一,数量众多,序列清楚,文化穿透的能力极强,连续发展的年代久远,这种颇具特色的器物被学术界称为“史前陶鬲”,以表示东夷族群的文化特征。因此,用标型器概括族属是中国考古研究的惯例,其优势不仅是言简意赅,名实相符,而且有助于在历史的长过程和辽阔的大空间考察上古族群的发生与发展。

就晋陕高原而言,晋中陶鬲对于定性有城族属、钩沉联姻制度、探索商人起源,以及重新定义区域特征都具有开创性的启发意义。可以推知,晋中陶鬲将与史前陶鬲一样,成为中原两翼上古族群研究的重要支点。

其次,妇好墓两次“撞脸”道破天机。一是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的发掘成果直接“撞脸”于省吾先生1959年“玄鸟归壶”的研究,为城商联姻再添新的考古证据。由于妇好生前的地位极高,在商史研究中影响很大,所以,古文字研究的科学预见性格外引人注目。

二是1980年妇好墓遭遇“被撞脸”。太谷白燕遗址的陶质嘍口罐“撞脸”妇好墓的青铜嘍口罐,将“妇好”的家乡昭告天下。过去,无人知晓的重要信息竟然成为完整证据链的关键环节,撬开了有城族属的历史大门,彻底打通了研究的最后一公里。这种“撞脸”已完全超越了器物间的简单比类,而是在殷墟与晋中两个地区间,在城商两种文化间,在晋中陶鬲的谱系与帝誉有城的历史记忆间建立起必然联系的桥梁,从而可断言:有城族属的女子不论是简狄还是妇好都来自晋中地区。而白燕嘍口罐与商代侈沿深腹鬲的完美组合,充分证明高领鬲乃至双鬲鬲的族属也只能属于有城。

在整个晋陕高原,还没有哪支陶鬲能像晋中陶鬲那样,从龙山时代中期兴起后,一骑绝尘,纵贯夏商两个时代,稳健发展,长盛不衰。这种历史长过程和时代大跨度其本身的意义不同凡响。

再次,是晋中陶鬲与城商联姻的阶段高度重合。城商联姻从帝誉简狄的始祖期算起,还有殷契开始的先商期,商汤开启的商时期,其对应的考古学标型器分别是双鬲鬲、高领鬲、深腹鬲代表的遗存。标型器物环环相扣,一脉相承;“撞脸”器物惟妙惟肖,铁证如山。有城族群的地望就这样无可争辩地锁定在晋中及以北的广袤地区。

联姻联盟 活力无限

有城族属和家乡的确定,实现了“透物见人”的关键一步,“格物见制”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于省吾先生说,“商代从先世契毋简狄一直到乙辛时期还与有城氏保持着婚媾关系”(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所以,帝誉与简狄的结缘就成为考察城商联姻绕不过去的起点。值得庆幸的是,相关的线索在白燕遗址编号F2的房址中获得关键性的突破,晋南釜型甗居然在此出现。研究表明,这种类型的陶甗在晋南地区是陶寺早期釜型甗的直接前身,而学术界公认陶寺早期是尧都平阳的遗存,依此,白燕F2的釜型甗无疑必是帝誉遗存的标型器,充分证明帝誉文化与有城文化的来往交集绝非空穴来风。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但却又在情理之中。而它就发生在名不见经传的太谷白燕,那里的房址、器物和特殊仪式遗存见证了历史事件的重要时刻。可见,帝誉简狄在文献记载中丰富,而考古资料也能透物见人,相得益彰。

简狄之子殷契为第一代商王,弱冠之后又与有城族群的女子结婚。由此拉开了城商联姻的帷幕,格物见制的问题水落石出。城商联姻从本质上说就是姑舅亲。俗话说,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这可能是上古时代普遍存在的婚配习俗。人们熟知的夷夏联盟、姬姜联盟莫不如此。只是,城商的联姻联盟数百年没有中断,而长期性正是制度性的直接反映。此外,姑舅亲在商人的联姻制度中居然占据主导地位,更是刷新了人们对上古制度的认知。据甲骨文研究记载,商王武丁有60多位妻妾,正妻只有三人,其中,妇好的地位最高。可见,商人联姻彩旗飘扬,姑舅核心大旗不倒。

当然,城商联姻除了姑舅亲上加亲的优势,凝聚力向心力与日俱增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有城族群的综合实力极其强大,远远超出现代人们的想象。现存资料的缺乏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有城真正实力的正确估计。有三种情况极易被忽视,一是庞大的陶鬲体系一定与族群挂钩,二是先秦文献对“九成之台”的记忆就来自石峁皇城台上的呐喊,三是“有城之墟”与石峁古城内在的逻辑联系。所以,绝不能只看石峁城址的规模,还必须关注物质文化的标识

和文化软实力的综合表现。

石峁古城的文化标识就是晋中陶鬲毋庸置疑。与晋中陶鬲早期的双鬲鬲别无二致,其年代早于忻州游邀遗址高领双鬲鬲遗存,即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遗存。

石峁石雕艺术风格直通商人铜器有目共睹。石峁石雕的艺术传统,在商代青铜礼器和玉器纹饰中依然能看到它的神韵,它们属于同一体系的认识,似乎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石峁的杀戮风俗与商人大体相同。石峁古城外城东门附近发掘出7座被砍伐的人头骨坑,死者多为年轻女性,其头颅还留有明显的砍斩痕迹,有的枕骨和下颌部位还有灼烧过的迹象。据分析,这些头骨坑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这种杀戮习俗只有在河北邯郸洹沟、郑州商城的壕沟和殷墟王陵的杀殉坑中才能见到。

石峁的殉人殉狗习俗与商人的如出一辙令人惊叹。近年,石峁皇城台发现墓葬区,殉葬1至3人不等,部分墓葬殉狗。此前,石峁内城韩家圪旦也发现过殉葬1人的墓葬。除石峁外,陕北神木神圪塔梁、陕北府谷寨山、山西忻州游邀的晋中双鬲鬲遗存各发现过殉葬1人的墓葬。这些是解读城商联盟绝佳的证据,是进一步探索先商文化共同体的基本抓手。石峁尚未发现与商文化直接挂钩的器物,但这些民俗文化基因的习惯似像先商时期城商联姻的商标一样牢牢贴在古城的墙上,供人们品味和思考。

《诗经·商颂·长发》对祖先的缅怀尤其值得重视。其中,“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绥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驱”的记载,讲的就是商人吸纳八方玉器的事情。虽然所描写的时代大致在成汤时期,但商人广纳美玉的嗜好却来自先商时期的城商联姻,石峁古城各路玉器不过是用自己的形态展示出这传统的源头而已,妇好墓750多件精美的玉器,则将族群的嗜好演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两种文化因素,无疑拉近了石峁与商人的距离。过去,人们不知道如何解读这些历史现象,而今,通过城商联姻的制度及其文化共同体的特征,把商人的风俗习俗和嗜好追溯到石峁古城就简明多了。这无疑证明了定性有城的正确性,城商联盟的真实性,“有城之墟”就是石峁古城的客观性。殷契生于有城,长于有城,成年后又与娘舅之女通婚,并开启城商联姻制度的先河。

石峁古城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史前最大城池。于是,各类研究蜂拥而上,各种推测纷至沓来。其中,有研究力挺石峁古城是黄帝所建。黄帝是历史文献记载的五帝之首,人文初祖,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很多未知事物属于他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证据更重要。在文化年代、遗存性质和族属关系尚不清楚的时候,仅凭历史文献摘录两可的片段记忆就妄下论断,难免重蹈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覆辙。

研究发现石峁古城的考古资料与黄帝的文献记载大相径庭,硬件软件存在不足。物质硬件是陶鬲遍地,陶鸟成群,习俗软件是殉人殉狗,杀戮成风,这些现象与黄帝的文献形象实有天壤之别,而恰恰是晋中陶鬲有城族群特有的文化习俗与制度传统,这些深深融入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是骨头里的记忆,绝非文化传播影响所能改变的。倘若没有直系的血缘关系和长期的共同生活,这种深刻的传统又怎能形成?殷契羽翼丰满之前,当随简狄生活,在有城族群的古老传统中学习成长,生活习俗耳濡目染,制度传统根深蒂固,所以,早期先商文化的实际内涵应是城商族群的人们共同体。有鉴于此,石峁古城就必是有城都城,废弃后成为“有城之墟”很是自然。而“黄帝说”不仅与之有巨大的时间落差,文化品格方面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由此可见,以往关于石峁古城的各种推测都经不起推敲,唯“有城之墟说”才能够独立潮头。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充分说明真理具有唯一性。

戎踪踪影 魅力高原

晋中陶鬲与有城族群的研究,为重新定义晋陕高原的区域特征创造了条件。

晋陕高原是中国独特的地理单元,是中国古代陶鬲的原生地和生产区,是语言学的晋语区。这里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环境封闭、资源丰富、民风淳朴、戏刷方言等很多方面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历史文献与甲骨文都说晋陕高原是戎的家乡。两周时期相关记载尤其为多。这个庞大族群中,有山戎、犬戎、条戎、奔戎、骠戎、有戎、羌戎等,按姓氏划分又有子姓、姜姓、怀姓九宗等不同系统,有城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由于文献的缺乏,史上对戎族群、戎大系、戎集团的认识始终若明若暗。然而,晋陕高原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形形色色的文化遗存均以陶鬲为特色。既有单把、环耳和双鬲的区别,又有弧裆分裆与庑裆的不同,还有蛇纹、堆纹与加厚领口的特色。戎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高度契合,使研究有充分理由认为陶鬲与戎族都是晋陕高原的主人,戎踪踪影极有可能就是一回事。所以,戎是鬲的使用人,鬲是戎人的使用物。晋中陶鬲只是有城族群的标识,西安客省庄的单把罐型鬲,晋南三里桥的鬻式鬲,东下冯的单把鬲,内蒙古朱开沟的花边鬲、蛇纹鬲,清涧李家崖的肥足鬲,无疑都是戎族大家庭的成员,具体属于哪个支系的戎则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古史上大凡记载戎的地方,普遍能够发现陶鬲的踪迹就是明证。

晋陕高原地区商人遗留的物质遗存非常丰富。从先世商、先商、早商到晚商屡见不鲜。山西不仅是殷契的故乡,更是商人姑舅联姻的加油站。但在商史研究中,简狄“吞卵生商”多被视为神话传说,所以,商族起源从来都以豫东、山东等地的文献为主,晋陕高原则沦为被遗忘的角落。然而,传统看法无法说明商人陶鬲的起源,因此都存在先天不足的致命缺陷。今天看来,商人起源的研究,必须坚持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必须贯彻于省吾以地下资料为主的倡导,学会用考古资料纠偏。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都证明,商人在太行山东麓“前八”“后五”的迁都大戏,始终没有离开过城商联姻的视野,不论走得有多远,都离不开对太行山以西的思念。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太行八陉”的射程

之内,难道还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吗?

晋中陶鬲的

研究表明,晋陕高原文化遗存标型器的组合是类型划分的重要依据,也是戎族支系划分的指标。有城文化与典型商文化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晋中陶鬲+卵形瓮,后者是商式鬲+大口尊,典型商式鬲在太谷白燕屡有发现,但大口尊却毫无踪迹。内蒙古朱开沟遗址是陶鬲+小型直口甗,晋南东下冯遗址是高领单把鬲+深腹甗,形成了戎族支系的文化分野。

在三代文明中,商周两代王朝的始祖都出自晋陕高原。商人是帝誉联姻有城的结果,周人是帝誉姜源结合的产物,他们均以鬲作为族群的标型器。在历史的进程中,最终都走出高原,实现了定期中原的伟业,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脉,三皇五帝的直根系,文明交响曲的特殊乐章,这是戎族群的伟大历史贡献,也是晋陕高原古代历史的辉煌与荣光。

综上所述,“城商联姻”不是单纯的婚姻形态,而是商人崛起的政治制度。制度引领,其利断金,是中华文明根在制度的历史见证。



白燕嘍口罐上部 H154:35



白燕嘍口罐上部 H120下:110



游邀晚期高领双鬲鬲 H2:55



游邀晚期高领双鬲鬲 H129:1



游邀早期矮领双鬲鬲 H291:1

■ 考古新知

在《小河西和兴隆洼文化的绝对年代》(《边疆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一文中,笔者就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绝对年代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以往学者多认为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绝对年代分别为9500/9000~8200 cal BP和8200~7200/7000 cal BP,我们则先剔除兴隆洼文化中与层位关系矛盾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后,提出兴隆洼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7700~7200 cal BP,并根据新发表的辽宁阜新贾家沟西遗址7例数据和阜新查海遗址1例数据,推断小河西文化的绝对年代为7900~7700 cal BP。这一断代结果将小河西文化的年代后移了1000多年,并将其年代范围压缩到200年以内,同时也将兴隆洼文化的年代上限后推了500年左右。这样的年代变更幅度不可谓不大。

但是,当时推断小河西文化的绝对年代时,可用数据仅来自两个遗址,并且这两个遗址都位于阜新。其是否能代表整个辽西地区小河西文化的整体情况,尚存疑问。此外,贾家沟西和查海遗址小河西文化的测年样品分别采自一座房址。用阜新地区两座房址的测年来推断整个小河西文化的绝对年代范围,是远远不够的。上述新观点亟待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的检验。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2023~2024年新发掘的内蒙古敖汉旗西刘家屯遗址的基本概况(《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综述》和《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综述》,分别载于《草原文物》2024年第1期和2025年第1期)。近来,该遗址新的测年数据也已发表(闫欣等:《内蒙古敖汉旗西刘家屯遗址碳十四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25年第3期)。这一关键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为检验上述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

西刘家屯遗址两个年度的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揭露房址9座、灰坑20座,出土各类遗物100余件。其中出土“陶器以窝点纹为主”,“另有极少量的交叉网格纹和短斜线纹等”。目前学界关于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基本内涵及二者分界的研究比较深入。根据“以窝点纹为主”这一特征,可以确定该遗址主体属于小河西文化。“极少量的交叉网格纹和短斜线纹”陶器的存在,则反映遗址小部分遗存的年代已经进入兴隆洼文化最早期或处于小河西—兴隆洼文化过渡期(杜战伟、韩斐:《论兴隆洼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考古》2019年第3期)。总之,西刘家屯遗址的年代应小河西文化至兴隆洼文化最早期。

采自西刘家屯遗址不同堆积单位的15个动植物样品,经过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后,结果全部落在8000~7600 cal BP。其中11个样品的年代范围落在8000~7700 cal BP前后,4个样品落在7700~7600 cal BP前后。这些测年结果与我们此前推断的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最早阶段的年代范围基本吻合。当然,这批新的数据显示,小河西文化的年代上限比我们此前推断的稍微提前了100年左右。据此,可以将小河西文化的绝对年代更新为8000~7700 cal BP年,而小河西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的年代分界或者说兴隆洼文化的年代上限大致就在7700 cal BP前后。

当然,这并非说小河西文化的绝对年代问题至此就可以完全确定下来。因为与阜新查海和贾家沟西遗址一样,敖汉旗西刘家屯遗址仍然落在小河西文化分布范围的东部地区,而以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一期为代表的、小河西文化分布范围西部地区的遗存尚缺乏明确测年。不排除这部分遗存有偏早或偏晚的可能性。但是基于白音长汗一期遗存与东部地区小河西文化遗存的相似性及二者向兴隆洼文化转变的同步性来看,即便其有偏早或偏晚的可能性,幅度也不会太大。因此,上述关于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绝对年代的推定应该不会再有太大幅度的变更。

总之,新的测年结果再次表明,小河西文化的年代较以往的认识晚了1000多年,其年代跨度也从原来的1000多年压缩到300年以内,兴隆洼文化开始的年代也较为肯定地确定在7700 cal BP前后。这里根据两种断代方案的年代跨度,把以往的年代观点称为“长版”方案,新的年代框架称为“短版”方案。

不仅如此,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新的年代框架还将对这两个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及其与中原地区裴李岗时代对应问题产生影响。

首先,学界对于小河西文化到底视为兴隆洼文化最早一期还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一直有争议。在原有的“长版”断代框架内,似乎更加支持小河西文化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方案。但是在新的“短版”年代结果面前,“小河西文化”的年代跨度与兴隆洼文化早、中、晚各期相差并不大,无论在年代跨度上还是文化特征上,其与兴隆洼文化早期的差异,相较于兴隆洼文化各期之间差异,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似乎又更加支持“小河西文化”作为兴隆洼文化最早一期的观点。当然,考古学文化的界定问题更多是约定俗成的,与其年代跨度的长短没有必然的联系。“小河西文化”无论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还是兴隆洼文化最早一期,其指示性的文化特征都是明确的。更重要的是,在探讨辽西地区小河西—兴隆洼文化的文化与社会变迁时,要基于“短版”年代框架来考量。

其次,在原有的“长版”断代框架内,小河西文化一直被对应中原地区的贾湖一期文化时期(约9000~8200/8000 cal BP),兴隆洼文化对应典型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约8200/8000~7000 cal BP)。由于查海遗址涵盖了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两个时期,有学者提出“查海文化”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可以更充分地表述9000~7000 cal BP这一时间范畴的时代。然而,新的“短版”年代结果显示,整个小河西—兴隆洼文化都落在8000~7000 cal BP的范围内,即对应中原地区典型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辽西地区真正对应中原地区贾湖一期文化时期的遗存有待继续寻找和探索,辽宁葫芦岛杨家洼遗址所代表的遗存或许属于这个时期或略早(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葫芦岛市杨家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